

周 素 园 传

唐 霞

周素园(1879—1958),名培艺,别字树元、澍元,贵州省毕节县(今毕节市)人。周素园的一生,横跨两个世纪,经历三个时代,参加三个革命,他是近现代贵州乃至中国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和亲历者,是一个朴素的爱国者、自觉的爱国者。毛泽东称他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尊敬的朋友与革命同志”。



1879年农历润三月初七,周素园诞生在贵州大定府(今大方县)属毕节县城。自幼受封建书香门第的薰染,“接受读书做官”、“显亲扬名”之类教育,积累了较丰厚的传统中华文化的治学根底。

1903年,周素园应普安知州方雪岑之聘,主普安师范传习所执教。由于周的文笔典雅,才思敏锐,为方所欣赏。1904年,发生了贵阳师范学校日籍教习冈山侮我国格人格,从而激发起该校学生罢课的风潮。消息传到普安,周素园等人十分愤慨。他在替普安州官员闵华甫致贵阳师范学校协理李裕增(字弗田)的信中慷慨陈词:“……然当此存亡绝续之交,生死骨肉之际,惟万众一心,作多方之努力。……而冈山横加侮辱,此其野蛮为何如!……故在今日,学可罢,交可绝,决不可坏团体、伤感情,作敷衍之周旋,和平了结。去一冈山,而百十之冈山无难招之立

至,彼自贖我金钱耳。以我同胞爱国思想之薄弱也,乃今始萌芽,忍不为之调护,而复加摧折哉!”此函虽为人代笔,确是周素园自己心曲的流露。

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一跃而为东亚强国,清末掀起的留学之风,影响在普安教书的周素园,他憎恨日本,却也渴望到日本去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希望能有机会“拨帜破浪”,东渡扶桑。1905年周素园离开普安来到省

城贵阳。

贵州官费、自费考选留学生,主持贵州大学堂的李瑞棻是十分关键的人物。李瑞棻曾因变法获罪,遇赦回到贵阳后,仍不遗余力地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又着手兴办实业,以求造福桑梓。周素园对李瑞棻的人格学识都十分钦佩。周素园因家境并不富裕,只得参加官费留日生的考选。以周的成绩,当然不成问题。主持考选事宜的李瑞棻,正兴办贵州全省铁路矿物总公司并担任总经理,其副总经理于德楷也是一名饱学的爱国绅士,两人都亟欲物色一年轻有为的助手。于是李瑞棻便约召周素园面谈,谓贵州百废待业,兴办实业为第一要务,但最缺人才,希望他能为社会而暂时牺牲个人利益,放弃出国深造的机会,留在路矿总公司工作。周素园既钦佩李的为人,又为李的真诚所感动,于是同意留在路矿总公司担任文案。此时,于德楷与贵州富绅唐尔镛酝酿筹设贵州通志局,于十分赏识周素园的才干,便以推荐周素园任通志局经理为条件,同意入股。周素园深知自己不谙书局业务,建议于德楷、唐尔镛,在创办书局的同时,利用其印刷设备,创办一报纸,表示愿为报馆竭尽全力。

1905年,周素园为购买印刷机械和培训技术工人前往上海。在上海期间,广泛结交朋友,认识了不少资产阶级爱国人士,并阅读了许多鼓吹资产阶级革命或改良主义的书报,接受了一些新思想,新学识,并与不少贵州籍的留日学生和旅沪人士建立了联系,共同探讨救国救民之道。1906年冬,周素园回到贵州,着手报纸的编辑出版。1907年8月17日,周素园经手筹办了两年的《黔报》创刊发行。《黔报》是贵州历史上第一份报纸,其宗旨是开通民智,服务社会。周素园是这份报纸的唯一编辑,实是主编。虽然《黔报》不是政治倾向明显的报纸,但对于落后闭塞的贵州,它确实起了震聋发聩的作用。10月22

日,周素园在《黔报》上以《瓜分之警告》为题,刊载了披露这年清政府签订《英俄协定》、《日德协定》和《日俄协定》的消息,指出中国被列强瓜分豆剖的危机已迫于眉睫,警醒人们奋起救亡。此一消息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贵州社会中上层的关注,并促成了贵州爱国救亡组织——贵州自治学社的成立。唐尔镛不愿自己出资办起的报馆为周素园所把持,便以老板的身份处处掣肘,施加压力,制造麻烦,迫使周素园就范或离开报馆。当时,张百麟等人正筹办《西南日报》,急需有人主持,1909年初,周素园便提出辞职,担任了《西南日报》的主笔。

该报意在团结西南数省,造成政治活动基地,以地方自治为口号,鼓吹爱国、救亡和变革。周素园在报纸的编排上大费苦心,不仅注重政治问题,而且关注经济、文化、社会。该报在资产阶级革命高潮来临前夕创办,“一以急进为宗旨。官吏及绅界有不法事,辄指责不稍假借,以是大招官绅之忌。”在传播新思想、新学识,揭露贵州社会的腐朽黑暗,促成贵州自治学社向资产阶级革命党的转化,促进贵州反清革命高潮的到来等方面,周素园和《西南日报》起了积极的作用。

1907年11月,张百麟在贵阳田家巷镜秋轩照相馆召集周素园等“黔中名士”30余人,成立爱国团体,并以“自治学社”为名,向官方申请立案。周素园虽不是该社的主要领导,却是发起人之一。1908年,自治学社集体加入东京同盟会,周素园也成了同盟会的一员。

在自治学社与宪政预备会的对立与斗争中,周素园利用《西南日报》这一阵地,积极撰写文章或编发文章,或出谋献策。在争取教育经费、争夺办学地点、打破封建士绅和资产阶级上层垄断贵州教育等方面,自治学社都取得了胜利。周素园是这些斗争的主要文字起草人和决策者。

1910年以后,在风起云涌的全国革命形

势的影响和同盟会反清革命思想的鼓励下，周素园开始同改良主义决裂，与贵州自治学社一样，迅速转向革命。

周素园通过办《黔报》和《西南日报》，其超群的才干已为社会所公认，巡警道贺国昌遂聘请他担任警务公所行政科长兼自治筹办处文牍科长，周素园还先后担任过贵州谘议局筹办处书记、贵州商务总会文案、贵州教育总会书记以及财政公所、学务公所的议绅等社会职务，他充分利用这些合法的身份和关系，宣传自治学会的主张。同时，又借警务科长的身份，探听官府对自治学社的态度，使自治学社所从事的革命活动有所掩护。周素园主张应充分利用新军、警察和学界，不主张依靠哥老会。并主动承担了秘密运动贵阳警界，支持革命党人反清。为了筹集反清起义的武器，周素园与张百麟等借当时风靡各省的监督财政之风，在贵州倡办国民捐运动，集结款项，购买枪弹。此事被宪政预备会头目任可澄等人破坏，密告官厅，当局遂借故拘捕负责购枪械的自治学社骨干陈永锡。一时间，自治学社社员多自危。而周素园武装反清的意志更坚定，他曾对人说：“我辈革命死，不革命亦死，等死耳。要以革命死为最大幸事，何惧哉！”

武昌起义成功，贵州武装起义箭在弦上，周素园运动警察中的一部份人参加起义。他以风声日紧，贵阳治安关系全省稳定为词，说服巡警道贺国昌添募巡查队 100 人，配发新式快枪，推荐自治学社社员汪直中等人为队长，在贵州起义时，省城警察完全听从他的指挥。

1911 年 11 月 3 日，贵州陆军小学堂首揭义旗，新军跟着响应，各路力量一起行动，贵州革命成功，贵州宣布独立，成立“大汉贵州军政府”，军政府由都督、行政总理、枢密院三部分组成，新军教练官杨蔭诚为都督、周素园为行政总理，张百麟为枢密院院长。革命成

功，百废待兴。有关贵州行政方面的除旧布新事项，全由周素园定夺后执行。当时，新军、旧巡防营和各地哥老会武装云集省城，人数逾万，恃功骄纵者有之，乘乱浑水摸鱼者有之，凭添了光复后的乱象。周素园向张百麟建议：“兵犹水也，不流则腐”，力主张百麟，杨蔭诚各带若干部队，分别巡观上下游，安定全省，并减少省城的混乱。当时，北洋军阀围攻武昌革命政权，全国革命派号召援鄂。周素园又建议由贵州派兵 3000 北伐，助川独立；然后会同滇、川两军北伐援鄂，增强武昌势力；更出荆襄至汴梁，截击北军，然后直捣幽燕。军政府遂决定派兵北伐援川援鄂。

由于贵州革命派的软弱，先与宪政派妥协，并使其参加军政府的领导。继而又接纳兴义封建团练头目刘显世及其团练武装，使刘显世掌握了军政府的部分军事领导权。后又对旧巡防营和哥老会众失控，为封建顽固派、旧官僚和立宪派合作，篡夺革命成果提供了方便。1912 年 2 月 2 日，反动势力收买部分旧巡防军人袭击自治学社领导人张百麟、黄泽霖的住所，黄泽霖被杀，张侥幸脱逃出走。当时，都督杨蔭城已率黔军北伐援鄂，都督一职由副都督赵德全代理，贵州军政府已陷于半瘫痪状态，反动派气焰甚嚣尘上。周素园毅然在改组后的军政府中任参议长，协助都督，参赞机要。3 月 30 日，贵州反动势力勾结唐继尧所部滇军，以贵州哥老会作乱，几成匪国为词，武装围攻贵州军政府、枢密院及黔军驻地，周素园逾墙得以幸免。滇军攻占贵阳，颠覆了贵州军政府，成立了以唐继尧、刘显世为首的贵州都督府，大肆捕杀革命党人。为逃避反动势力的毒手。周素园间道逃离贵阳，途经毕节入川，开始近 10 年颠沛流离的生活。

三

1912 年 5 月，周素园流亡到重庆，与先

期流亡在渝的自治学社骨干黄德铣、王焰奎等人一道,在重庆镇守使的帮助下,由周素园执笔写成《贵州血泪通告书》及《贵州绅学军商致各省电》,分别通电各省,将自治学社领导革命的经过及宪政党人与唐继尧等破坏贵州革命之情形一一写出,声讨滇军及反动势力,呼吁伸张正义。同时,周素园还起草了《与云南省议会书》,陈述贵州革命及滇军人黔颠覆贵州军政府的真相。随后又顺长江东下,抵达武汉,会见黎元洪,控诉唐继尧、刘显世等人的罪行,起草《致北京政府》、《致国务院》、《致孙中山》、《致袁总统》等函电,为自治学社正名,为贵州革命派鸣冤,揭露贵州反动势力的倒行逆施。

1912年底,北京政府成立以冯自由为局长的临时稽勋局,以嘉奖辛亥革命有功人员。黎元洪特致函该局,为周素园、张百麟等人请奖,旅京贵州革命党人公推周素园主稿。周素园愤笔疾书,连夜以个人名义写成《上临时稽勋局论贵州革命始末书》,冯自由延聘其为稽勋员,委托他专办贵州稽勋问题。在1913年1月至4月的时间里,周素园写成贵州稽勋案,交付审议。现保存下来的《稽勋表册底稿》四册中,总计为贵州辛亥革命前后有功的人员302人请勋。这302人请勋的简历事迹约30万余字,是研究辛亥革命在贵州的极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其中除周素园本人在内5人的材料系由陈永锡草拟后,附于表册末外,其余297人的材料,全系周素园亲自拟就。

1913年5月至10月,周素园经人推荐,入参议院秘书厅任秘书。其间,为申告贵州革命派冤情,敦促北京政府解决贵州问题,周素园还为首组织了黔人冤愤团,起草了《黔人冤愤团宣言书》等有关文件。贵州都督唐继尧对周素园揭露其罪行恨之入骨,密告袁世凯,诬“冤愤团”为反革命机关,周素园系民党魁首,利用“冤愤团”谋反。袁世凯下令解散冤愤团,通缉周素园。11月,周素园被迫离

京,辗转回到四川。暂在重庆小住,后又转往泸州。1914年6月,又避之重庆,后奔汉口,暂居于英租界,靠向亲友借贷度日,闭门读书。此后相当一段时间,周素园穷困羁旅,年未逾40的周素园,其衰老之像已如六七十岁之人。但他并未完全沉沦,心中仍盼着有朝一日“冀清河之可俟,庶巨憝之伏诛”。

1917年,周素园相继任职交通部顾问,众议院秘书厅秘书,均为时不久即解职,后终日闭门研读明史,整理文稿。一家5口的生活,全靠借贷维持。

1918年3月至5月,周素园在奉军副总司令徐树铮处任职,实际上无多少事可干,不过是领取一份俸禄维持生活而已。因此,他有不少空闲时间初步整理自己的旧作。两年左右,整理《素园文集》5卷、《别集》4卷、《书牍》12卷、《贵州革命人物志》4卷、《随笔》3卷。

1920年,黔军总司令王文华到上海后,与流亡沪上的自治学社社员多有接触,并约请周素园到上海见面。周素园到上海后,王文华对他坦诚相待,欢迎他回贵州,并说:“目前预定我以黔军总司令兼贵州省长,请你当总司令部秘书长兼政务厅长。经过一个时期,就请你继任省长。凡参与辛亥革命的人,谁不知道你,这是贵州人的公议,你也用不着谦让。至于当年出亡同志,请你开列名单,我都分送旅费,尽先回籍”。周素园听了王文华这番话,同意先回北京,收拾交待,然后拟同王文华一道回黔。

1921年3月26日,王文华被刺,周素园回黔服务的打算又一次落空。稍后,王文华之兄王伯群在上海宣布孙中山的委任就任贵州省长,卢焘就任黔军总司令,力图巩固“新派”对贵州的控制。王伯群催促周素园先回贵阳,在贵阳的黔军参谋长何应钦亦来电敦请。周素园为践前诺,不顾前途艰难,于6月中旬由上海启程,于10月2日回到贵阳,被

任命为黔军总司令部参议,后又一度兼任省长公署秘书长。此时的贵州,由于王文华死后,群龙无首,出现了卢焘、谷正伦、张春圃、胡瑛和何应钦五个旅长纷争局面,其中,以何应钦与谷正伦的矛盾最为突出。1922年1月,何、谷矛盾激化,何被赶走,周素园因何应钦的关系自然被视为异己,被迫离职。

1922年5月,袁祖铭“定黔”成功,黔军各部队纷纷拥护袁祖铭,黔军总司令卢焘去职,谷正伦、张春圃等失势后流落广西。袁祖铭深知只有利用周素园的人望和才干,才能巩固自己的统治,欲请周素园出山。周素园只得又一次违背初衷再入政治旋涡,当上袁祖铭任总司令的黔军总司令部的秘书长。8月,袁祖铭当上贵州省长,便委任周素园担任政务厅长兼省府秘书长。

1923年7月,周素园又到上海暂居了十个月,这期间,他读了一些马列主义的书籍,对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亦有所了解。尤其是结合自己的亲自经历,对军阀统治的黑暗反动有了较为正确的认识。

1924年5月,袁祖铭为川黔边防督办,设办公署于重庆,请周素园担任公署秘书长,周素园旋到重庆就任。1925年8月,周素园向袁祖铭坚请辞职回乡,并认为“生平只有被袁鼎卿屈服,是我一个污点。贵阳时期是武力的劫持,重庆时期生活没有完全解决,也占这次合作的相当成份”。

9月7日,周素园回到故乡毕节,闭门读书,静下来反思自己的人生道路和探索中国的问题,他订阅了许多报刊,购买了许多书籍,其中经过他研读的有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卢梭的《民约论》等,特别对周素园后半辈子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莫过于一批马列主义的原著和介绍马列主义的书籍。如《国家与革命》、《通俗资本论》、《共产主义ABC》、《新政治经济学》等,共达十余种。他开始相信马

克思主义的一些道理,认为它比以往所学的任何理论都能说服自己。在读书的过程中,周素园还写了不少文章,其内容涉及军事、宗教、妇女、家庭、社会等等方面。1927年至1928年间,写下了他的代表作《贵州国民党痛史》。以亲身的经历,评细叙述了贵州资产阶级革命发生、发展、失败以及挽救革命的全过程,该著述成了研究辛亥革命在贵州的重要历史资料。

四

1936年2月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六军团占领黔西北重镇毕节,在解除误会后,红六军团政委王震和政治部主任夏曦会见周素园并与之进行了交谈,周素园向王震、夏曦坦然地讲述了他的思想,他说:“我研究马克思主义10年了,我觉得马克思讲得对,我相信马克思主义。你们共产党、红军,是讲马克思主义的,所以我用不着走”。王震、夏曦又说:“你研究马克思主义好。现在我们共产党的政策要抗日反蒋,你赞不赞成?”周素园连声说:“赞成,完全赞成”。此后,王震、夏曦经常到他家里同他交谈,宣传和解释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红军北上抗日的必要性。二、六军团领导决定以中共贵州地下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以及反蒋地方武装席大明部和周质夫部,组建贵州抗日救国军,请周素园出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员,周素园毅然允诺。中共贵州省工委的军运委员邓止戈任政委,改编席大明部为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一支队,周质夫部为第二支队,阮俊臣部为第三支队,并从红军政工干部中抽调三人担任三个支队的政治委员。1936年2月14日,贵州抗日救国军成立大会在毕节城关小学操场上隆重召开,周素园正式就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员。

1936年3月10日,周素园告别故乡亲友,随红六军团一道离开毕节,开始了艰险而

光荣的长征。长征前后,周素园充分利用自己的影响及与滇军上层人士的故旧关系,开展统战工作,给龙云、孙渡等滇军上层人物写信,这些信件,对于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实行分化瓦解起了积极的作用。正如红六军团军团长肖克所说:周素园的信“打中了他的要害。所以孙渡就在威宁、昭通,按兵不动。国民党追击军主力从东面向我进攻,但孙渡纵队在西面按兵不动的态势,就利于我们集中主力对付东面来的敌人,能在毕节停留近20天,休整补充”。红二、六军团顺利通过云南、渡过了金沙江。

周素园参加长征时,已经57周岁,但由于他一生坎坷,体弱多病,未老先衰,只得乘坐滑杆随红军转战乌蒙山中。黔西北、滇东北一带山高林密、气候恶劣,地脊民贫、人烟稀少。部队经常在雨雪纷飞中行军。3月11日,周素园随红军团到达云南镇雄县境之牛场时,他的身体更显衰弱。任弼时、贺龙、王震等领导人担心他不能经受长途跋涉的劳苦,在给养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准备拨出一笔黄金送他到香港,一方面治病,一方面做统战工作。并派邓止戈去做周素园的工作。周素园所后,激动地说:“我今年快60岁了,以前都没有找到光明。今天参加了红军,正是我一生中最高光的时刻,死也要死在红军里。我不愿离开红军”。周素园坚持与红军指战员一起,历时9月,行程近万里,走完了史无前例的长征路。在完成长征的同时,也实现了他人生道路的转折。

“七·七”事变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周素园被八路军总司令部任命为八路军高级参议。在延安时期,党组织和同志们对他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贺龙夫人和肖克夫人经常去看望他,帮助他缝补洗涮;组织上在物资奇缺的情况下,给予他生活上的各种优待。但由于他年事已高,体质很弱,两足红肿,流血流水,生活亦不能自理。虽然

医护人员悉心护理治疗,但却久不见好。周素园感到自己不唯不能工作,反而“坐享优待”,成了组织上的累赘,于是产生了回贵州继续为党工作的念头。他把自己的想法写信告诉了毛泽东。

1937年10月6日,毛泽东给他回了信:

素园老先生:

……我们觉得你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尊敬的朋友与革命同志,并不觉得你是“坐享优待”。先生的行止与工作,完全依照先生的健康、兴趣来决定,因为先生是老年人了,不比年轻人,这一点不但我们应顾到,先生自己也应顾到的。只有在比较更适当的条件与环境之中,健康更有保证些,工作才会更好些。

先生提出回黔并工作计划,如果已下决心,并认为这样更好的话,我是全部同意的。……先生是一个奋斗的人……临走时请留下通讯处,何时走,我来看你。

敬礼!

毛泽东

十月六日

临离开延安之前,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设宴为周素园饯行。毛泽东说:“周先生,你虽然没有入党,总算红军的一员,交情如此,不可以不知道历史,行前你可否简单的写一点留给我”。次日,周素园将自己的自传送给毛泽东。周素园还应毛泽东之请,写下临别赠言:“政权一定是你们的。共产党是吃苦耐劳,国民党是贪污享乐,醉生梦死。共产党是命令贯彻;国民党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就拿这两点作一个比较,稍有常识的人,都能判断最终胜利属于谁。但我希望取得政权之后,共产党不要变质”。

五

1937年10月23日,周素园带着毛泽东给国民党西南各省军政要员的信离开延安,

11月8日,抵达重庆,致函要求面见军事委员会西南行营参谋长贺国光。他一连给贺国光去了三封信,说明自己受毛泽东、朱德委托,“回藉道经成都、重庆、昆明、贵阳,请与军政当局接洽释放政治犯,增加抗日力量”。但是贺国光拒绝接见,也不释放被囚禁的政治犯,只在复函中不着边际地应酬。正当他滞留重庆的时候,国民党贵州当局以“共产党嫌疑”逮捕了他的大女婿王崇素,以此对他进行警告。周素园在重庆的工作未有结果,于11月底转赴成都。因时任四川省代理省主席的邓汉祥系贵州盘县人,辛亥革命时即与周素园有交往。邓汉祥聘周素园为四川省政府顾问,周素园向邓谈及延安的情况,特别是边区各级学校艰苦办学的情况,使邓深受感动,答应汇4万元补助陕北公学。

1938年元旦,周素园在成都《华西日报》元旦报刊上发表《受血的教训以后》一文,针对正面战场的节节失利,指出中国抗战中军事、政治和外交上存在的缺点,委婉含蓄的批评了国民党政府的抗战路线,引起了国民党四川当局的不满。

周素园在成都致函龙云,并寄去毛泽东致龙云的亲笔函,希望龙云遵照国共合作宣言的精神,授引南京、上海成例,释放在押政治犯,使他们能够参加抗日战争,报效国家。龙云两次电邀周素园赴昆明。周素园于1938年1月12日飞抵昆明,受到龙云和云南军政当局的欢迎。2月初,龙云委任他担任云南省政府咨谋。当时的昆明进步人士往往把周素园当作共产党的代表,乐于与他接近,并经常约他谈话。他借机会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表扬八路军抗日的英勇战绩,驳斥国民党的造谣诽谤,使不少人了解了延安和共产党的真实情况。周素园的活动,引起了云南当局的不满,便多方限制周素园的行动自由,周素园只得离开昆明。

1938年4月13日,周素园回到贵阳,贵

州中统特务室的主任陈惕庐便以省党部的名义,对他提出警告,让他迅速回毕节,不得在贵阳久留。省会公安局长肖树经也“规劝”他回原籍休养,不要自惹麻烦。周素园别无选择回到毕节,而毕节地方当局亦是优礼有加,暗中监视。10月,贵州当局委任他担任贵州省政府参议。1941年4月,中国国民党史编纂委员会聘请他担任采访。

在毕节,他先后研读了《资本论》、《反杜林论》、《法兰西内战》、《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列正文选》、《列宁主义问题》、《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皖南事变后,贵州当局掀起了新的反共高潮,周素园与中共贵州地下党的联系也完全断绝。

1945年春,国民党当局召开国民参政会,周素园被选为参政员。之后,基本上闭门谢客,极少与当权者交往,潜心于著述和读书,希望在有生之年,给后人留下多一些的史迹。先是,1940年底,周素园开始撰写《贵州护国·护法两役战史》。1941年7月,总纂《毕节县志》。11月起,始作《贵州陆军史述要》。之后,又断断续续整理《素园文存》和《素园书牘》14卷。至1947年二月,他开始撰写参加红军长征的回忆录,1948年5月约4万余字的《西行追忆录》终于脱稿,但此珍贵的稿子后来散失。

1949年11月29日,毕节解放的第三天,周素园草拟致毛泽东主席电报,托人代发,电文写道:“北京。毛主席,别来11年,衰生犹及见解放成功,不胜欣忭,谨贺胜利。周素园叩嗑”。

六

“期待着光明,等候着光明,望见了光明,光明来到了!”这是周素园1950年元旦在他自己命名为《光明日记》的扉页上的题词。

家乡解放,周素园不顾年迈体弱,立即投入支持人民解放军进军四川的工作,他被群众推举为毕节县支前委员会主任,后又任毕节地区支前委员会主任,为解放军筹措进军四川的粮秣。他还团结当地的进步人士协助人民政府的干部做好恢复社会秩序,建立政权和扩大统一战线方面的繁重工作。他主动给当地一批逃往边远山区企图负隅顽抗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写信,规劝他们只有放下武器,起义或投降。他热情地充当了人民政权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桥梁。

1950年2月23日,周素园应苏振华政委和杨勇司令员之邀到贵阳,参与人民政权的工作,广泛接触社会各界人士,听取他们的意见,转达贵州省有关领导人的指示。1950年6月28日,周素园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7月下旬,赴重庆参加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8月初回到贵阳履任。

在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任上,周素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投入了建国初期的重大政治运动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工作。

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周素园身体力行,把自己的思想和家庭都摆进了这场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根基的斗争之中。尽管人民政府和广大群众因他特殊的贡献而没有把他的家庭当作地主来对待,但他却从思想上严格要求自己,要求家人在这场变革中与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和生活习气彻底决裂。

周素园以巨大的政治热情,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积极投身抗美援朝运动。

在贵州的剿匪斗争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周素园满腔热情地支持,并发表文章,热情歌颂剿匪斗争的胜利;鞭挞危害人民的反革命,号召人民群众起来彻底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反革命。

1951年10月,周素园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他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王震、肖克等领导人

的亲切接见。毛泽东单独接见他,谈话40分钟,毛泽东和他谈到了土改问题、抗美援朝问题、镇压反革命问题、统一战线问题。周素园由于健康状况不佳,提出辞去贵州省政府副主席职务,毛泽东说:“精力自然差点,脑筋还很好的。你只要坐在那里起带头作用,什么都好了。以后政协开会,你能来就来,不能来就不要勉强。总之,以身体为第一”。临别时,毛泽东送了他一盒燕窝,嘱他好好保养。

1954年,周素园抱病开完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并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2月,周素园被任命为贵州省副省长。

1953年,贵州省文史馆成立时,担任馆长。他要求文史馆的馆员,应多多留意贵州少数民族,认真研究少数民族问题。

1956年11月,他针对在农村已经显露的“左”的一些做法,起草了一封给毛泽东的信。他在信稿中认为:“合作化运动,大体说是农民自愿的。可是一般说来,条件还不够成熟”。有的基层干部“为了避免右倾保守,他们一股劲的冒进,遇到障碍更加上强迫命令。个别干部,他们那种主观武断,不按政策办事,几乎令人不能置信,好象是他们有意脱离群众似的”。“我认为,我们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90%以上增加收入这一口号能否实现的问题”。他建议:“秋收后将农业税的一部分,作为一次特别农贷,即一次无须偿还的农贷,使农民皆大喜欢”。“我知道,这建议牵动了本年预算,甚至牵动了五年计划,本不应该瞎说。但古云:‘月晕知风,础润知雨’,群众情绪是可以捉摸的,动向是不难预测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敢保证不出弊漏”。“弥患无形的措施,可能受到人们的反对,但是一点雨、一点湿,我相信它是不会落空的”。他知道这一问题关系十分重大,几(下转55页)

画,提出“治国平天下,先从修身始”的口号。在《北大的文明修身活动宣言》中这样写道:“今天的时代不仅需要机敏的头脑、渊博的学识,同时需要高尚的人格和先行者的勇锐,需要他们去完善自己,发展自身,擎起这个世界的依托!正是基于此,我们呼吁北大人,思考起来,行动起来,从小事做起,从点点滴滴做起……”于是不文明的现象被拍成照片展出曝光,学生志愿者队伍在校园维持秩序和纠正不文明行为,做好人做好事者日益增多,大家都从凡人小事中体味到了“个人素质的提高和品德的升华。”国际政治系的同学写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为始,修身为本。吾身不修,吾心不美,吾行不善,何以齐家齐校,何以治国平天下。”

为把修身活动引向深入,活动中,学校请来摩托罗拉中国公司总裁赖烦荣、四通集团总裁段永基和北大方正总裁王造,分别讲企业管理与为人处世,讲创业经历,讲诚实待人,讲合作精神。同时,开展“读书与修身”、“艺术与修身”、“实践与修身”等活动,利用假期深入社会研习国情。

李岚清副总理曾为此专门写去贺信。信中说:“修身教育活动是一种有意义的尝试,相信会在提高新一代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方面发挥积极有益的作用”。

1988年元月,全世界诺贝尔奖金获奖人云集巴黎开会,会议结束之际,发表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宣言: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250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

孔子作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其思想学说确实不受时空、国籍的限制,影响是深远而广泛的。他的关于修身的论述,之所以直到今天都还有现实意义,这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

修身非一朝一夕之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非一人之力所能奏效,它要求全社会共同参与,更要求日复一日的严格自律和常行不懈的自觉坚持。

(龙连荣 黔东南师专)

责任编辑 黄寅瑞

(上接18页)经修改后,亲自誊正,送给省里的一些领导人审阅征求意见,因一些客观原故,这封信没有寄出。

周素园对自己和子女的要求都是十分严格的,他没有把中央及省军区领导对他的特殊关怀作为资本,而是感到受之有愧。他拒绝省里给他家增加服务人员的决定。组织上给他配了工作秘书,但凡重要的文稿,他都要自己起草,抄写。他阅读文件从不敷衍画圈了事,而是认真阅读,有心得或意见便记下来,及时反映。周素园认为自己的缺点很多,

“不配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没有申请入党”。

周素园在工作繁忙,体弱多病的情况下,似旧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理论水平和思想觉悟,读书、看报、写作是他除了日常政务工作外的必修课。

1958年2月1日,周素园患肺炎,多方抢救无效而逝世,终年79岁。

(唐霞 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 王羊勺